

双重挑战下的都市新闻业： “媒介化风险”与“消逝的地方”

王辰瑶¹

【摘要】 新闻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与地域相关，但新闻实践中的“地方性”却较少被新闻研究关注。本研究聚焦以重要地方性城市及其辐射区域为边界的“都市新闻业”(metropolitan journalism)，从现代社会理论关注的“风险”和“地方”问题入手，探讨了都市新闻业面临的挑战。具体来说，都市新闻业既面临“媒介化风险”的压力，又受到“消逝的地方”这一现代性后果的深重影响。都市新闻业在新闻系统结构中的夹心层位置和相对固化的行动路径，使其在应对这两重挑战时出现较多困难。尽管新闻学研究近年来经常启用“危机”概念来阐述数字技术冲击下的新闻业状况，但整体性的新闻业危机话语尚不足以解释都市新闻业的独特问题，而“媒介化风险”和“消逝的地方”也许可以提供对都市新闻业困境的深层理解。都市新闻业可能的创新路径是以复杂关系驱动的创新，即通过制度赋权提升都市新闻业的灵活性和再嵌入地方生活的能力，以此应对双重挑战，更好地激发地方新闻生态的活力。

【关键词】 地方新闻业 都市新闻业 风险社会 新闻创新 新闻业危机

【中图分类号】 G2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63(2022)06-0121-09

新闻研究一向看重“时间”，无论是从传播技术角度阐发“时间消灭空间”的媒体发展趋势¹、从新闻生产社会学研究新闻“因时而作”的实践特性²、“追分赶秒”的职业文化³，以及网络时代给新闻业带来的越来越快的“加速”压力，已留下了堪称丰富的成果。相比之下，“空间”问题在新闻研究中较为缺失，近年来才开始响应社会思潮中“空间转向”的呼声，出现了一些凸显“空间”问题的新闻研究成果。新闻以“新”为特征，强调对其“时间性”的考察，理所当然。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现代新闻业从诞生之初就是地方的，与所在的城市经济文化因素密不可分，此后才有部分佼佼者逐渐扩张，成为全国乃至全球性媒体（尽管在媒体品牌中常常还保留着地名）。直到今天，绝大多数新闻媒体也仍然是“地方性”的，然而从新闻研究上看，它们不合比例地少于对全国和全球知名新闻媒体的研究，用“沉默的大多数”来形容也不为过。

近年来国际新闻学研究中观察到的一些现象如“新闻荒漠化”等⁴已引起高度警觉，这说明地方新闻业在数字时代可能正在遭遇重大困境。虽然“危机”(crisis)已成为研究者们描述新闻业在数字时代境况时常用的术语⁵，但现有关于新闻业危机的研究是一个针对传统新闻业的总体诊断，尚不足以解释地方新闻尤其是都市新闻业(metropolitan journalism)的独特问题。而英文文献关注较多的地方新闻荒漠化的后果，尽管很有警示意义，也不能照搬到中国语境。当下都市新闻业可能面临哪些问题？如何针对这些问题提出新的理论解释？尤其是中国都市新闻业曾在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颇为辉煌，是上一轮新闻创新中的主力军，作为创新结果的“都市报”改革、“民生新闻”等都深深影响着中国新闻业的格局。那么在快速进入数字时代后，都市新闻业为何在转型创新中颇显吃力？基于对中国都市新闻业的观察以及对国际上“地方新闻业”(local journalism)相关研究的梳理，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一些理论性阐释。

这里还要对“地方新闻业”与“都市新闻业”这两个概念略作说明。目前的研究中对这两个概念的使用是比较模糊的，尤

¹作者简介：王辰瑶，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导南京 210023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全媒体新闻生态系统创新研究”（20XWA001）的阶段性成果

其表现在对“都市新闻业”的归属认定上。有些研究不会刻意区分这两者，当要显示与全国性新闻或总体新闻业之不同时，研究者会不加区分地使用地方、都市、本地等限定词，这都是为了凸显研究对象的“地方性”特征。如下文要提到的安德森(C. W. Anderson)的专著《重建新闻》，副标题是“数字时代的都市新闻业”，开篇则描述“地方新闻业”的危机。此时，“都市新闻业”是属于“地方”的。但另一些研究则强调地方新闻和都市新闻的差异，有比较激烈的观点认为，与大都市新闻和全国性新闻从业者相比，地方新闻从业者是“完全不同的品种”。⁶此时，“都市新闻业”则是“非地方”的。“都市新闻业”在新闻地域文化上的模糊性，正反映了它在新闻业格局中的“夹心”状态——与锚定全国乃至全球新闻市场的媒体相比，它是地方化的；与扎根社区、小城镇、乡村的带有“本乡本土”气息的那些地方媒体相比，它又有去地方化的色彩。本文这里不打算更多讨论这些概念的规范使用，但要指出，这种在概念上呈现的定位模糊，恐怕也正是当下都市新闻业“夹心层”位置的一个写照。

本研究在更偏向“地方”的意义上讨论“都市新闻业”，视其为地方新闻业中最有力量 and 最重要的部分，并认为它与全国性新闻业的差异是重要的。都市新闻业的地域边界一般以重要的地方性城市及其辐射区域为划分，按照一国的行政区划和人口、经济等统计指标来定是通行惯例。如一项对澳大利亚都市新闻业的实证研究，把澳审计局列出的 22 个大城市作为选取研究对象的依据。⁷但很多时候，研究者也就以约定俗成的“大城市”、“一线城市”为范围。在观察和讨论中国都市新闻业问题时，本研究主要指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的主流新闻媒体，如省级和省会城市的报业集团、广播电视集团等。

一、都市新闻业陷入被“边缘化”的困境

都市新闻业并非仅意味着地理空间的界限，它的兴起伴随着发现新闻市场、形成与市民的密切联系、嵌入城市生活的过程。创办了美国埃德菲大学的莱弗莫尔(Charles H. Levermore)，曾在《美国历史评论》上靡不悉备地介绍 1800—1840 年间纽约地区都市新闻业如何兴起。⁸夏德森(Michael Schudson)则将这段历史称为“便士报”革命，它从纽约兴起，并迅速扩展至波士顿、费城和巴尔的摩等都市，由此“在 19 世纪 30 年代，报纸不再只反映一小群商业精英的生活，而是描摹大都会的迅速崛起以及多彩多姿的贸易、运输、制造业等中产阶层活动”。⁹暂且撇开对这段历史演绎出的各种简化、唯一化、意识形态化的叙述不论，回到行动本身的话，不难看出这就是早期新闻业的一次重大创新——发现新市场、结成新关系、推出新产品，并获得了成功。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兴起的中国“都市报改革”也是一次在新闻改革过程中的创新。1994 年底，一份名为《华西都市报》的《四川日报》下属子报在成都悄然试刊的时候(1995 年 1 月 1 日《华西都市报》正式创刊)，后来被称之为“都市报现象”的新一轮报业改革也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定位为“市民生活报”的《华西都市报》创新大获成功，这一模式也迅速扩散：如 1995 年 3 月，《南方日报》在广州创办了《南方都市报》；1995 年 6 月，《湖南日报》在长沙创办了《三湘都市报》；1995 年 8 月，《河南日报》在郑州创办了《大河报》(原名《大河文化报》)；1995 年 9 月，《广西日报》在南宁创办了《南国早报》；1996 年 1 月，《河北日报》在石家庄创办了《燕赵都市报》等，这类主要由省级党委机关报创办的都市类新闻报短短数年内就在全中国遍地开花。都市报当然不是都市新闻业的全部，但回顾这一轮新闻改革的历程，可以重温都市新闻业的特点。笔者曾在《新中国新闻报道史暨代表作研究》中将其概括为新闻业萌发了“重新发现生活”的新闻选择意识、在“新闻—政治”范式下开辟出“社会”纬度的话语空间、并与本地居民、市民结成紧密关系的过程。¹⁰

然而，不同语境下的都市新闻业显然都没能在数字化、网络化的新媒体时代延续它们过去成功过的创新路径。安德森在《重建新闻》中开篇就直言“命悬一线的地方新闻业”。他所观察的美国费城曾经有稳定而强健的都市新闻业，有两家同属于一个报团的大费城区域报纸《费城问询者报》和《费城每日新闻报》，但费城都市新闻在 2008 年的新闻业危机中变成“一项越来越不稳固的事业”，最终破产重组。¹¹安德森记录的还只是费城都市新闻业在数字化早期的经历，那时社交媒体甚至还没有出场。在纽约州第二大城市布法罗有三十多年新闻从业经历的专栏作家笔下，美国地方新闻业图景更是惨淡：自 2004 年以来，美国有超过 2000 家报纸死亡。数以百计的美国小城市已经是“新闻沙漠”，地方报纸“正在悄悄离开，再也不会回来”，而且许多剩下的地方报纸也只图具其表，丧失了活力。¹²尽管目前大部分出现“新闻沙漠化”的还是小城市，但这种地方新闻无法在地方生存的趋势是令人担心的，因为它不仅宣告某一家地方媒体“关门”，而且意味着对地方事务起守望、监督作用，并在地方生活中扮演平衡沟通角色的制度性力量消散了，这种趋势可能因为新冠疫情而变得更严重。

英文文献近年关注较多的新闻荒漠化问题，并不适用中国情况。经过多年媒体融合转型，国内都市新闻业都发展出了庞大的新媒体矩阵，地方性新闻渠道应该说是空前繁荣，不存在荒漠化。但若对照前述都市报改革时期的情况，目前国内都市新闻业在三个方面也都出现了一些不容乐观的迹象，呈现出被迫“边缘化”的困境。

首先，在地方新闻市场上，处于被挤压的收缩状态。在数字时代的杂糅媒介系统中，过去都市新闻业在地方新闻市场上比较优容的空间已日趋逼仄。地方新闻市场上新增加的许多竞争者，包括大型平台媒体的地方频道、细分垂直领域出现的各类原生媒体等，都在切分本来属于都市新闻业的收益蛋糕。近年来不少地方新闻业因而改变了生存策略：缩小在外部市场的风险投入，弱化对由用户构成的新闻市场的开拓，转而在体制内寻求更稳定的政务服务收益。这种向内转的策略，对都市新闻业解决生存困境来说是理性选择，因为都市报业集团和广电集团的位置足以获得体制内地方行政事业单位的信任，又可满足这类机构在数字时代多出来的“媒介化”需求。这种“政务服务模式”是用“非市场需求”来解决既有媒体生存问题的方式，但能不能持久获得这些“非市场需求”最终还要看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基础，如果这个基础不存在了，那么这些为党政机关服务的“非市场需求”也会离场。¹³此外，因为向内转的政务服务模式相对缺少透明性，都市新闻业不容易通过这种方式建立公众信任。一项对中国东南某报业集团记者的深度访谈研究发现，对地方政府进行正面报道以换取财政支持的“品牌宣传”形式，在媒体财务危机的背景下，被记者们作为“权益之计”给合理化了。¹⁴这类做法虽然可能给当地媒体带来短期经济收益，但也有损害地方新闻质量的风险。

其次，与地方新闻使用者的关系上，正在磨损曾经的亲密感。作为一种特定的建构社会现实的文化类型，新闻必须面向公众。近年国内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的一个重点是学习习近平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系列讲话。研究者认为，习近平新闻舆论观的两个要点是尊重党性、尊重规律，落脚点则是“以人民为中心”。如在2013年8月19日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首次明确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落脚点都是人民”。¹⁵地方新闻业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它能提供本地群众欲知、应知而未知的新闻议题，且这一功能很难被代替。有很多地方事务并不具有全国性的新闻价值，难以被全国性媒体关注，但对当地人却是重要的。如《华西都市报》试刊时就报道了在成都展览馆举办的上海轻纺产品博览会假冒伪劣产品多的新闻，并且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接连报道了20次。对于这样一个读者投诉来的新闻选题，如果在以往的新闻操作观念下，最多是发一条消息了事，因为它既没什么“重大性”，也没有多少“教育意义”，但在当时都市报新的选题标准下却成了重点报道。事实也证明，这的确捏准了市民读者的需求。《华西都市报》在创办后的一年时间里还先后做过“四川打工妹在山西受虐待”、“陈道荣之死”、“孩子回家行动”等38个追踪报道，每做一次，“报纸的发行量就跃上一个新台阶”。¹⁶反观如今的都市新闻业已经很难再对本地读者产生这样强大的影响力，常规的地方新闻报道经常反响寥寥，稍有差池还容易酿成舆情事件。比如新冠疫情发生的近三年里，多个主要城市的地方新闻媒体因疫情报道方式在网络上“挨骂”，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第三，对地方社会生活的守望能力下滑。地方新闻使用者是否认可信赖地方媒体，与地方新闻媒体关注当地社会、嵌入本地生活的程度息息相关。一些国外新闻学者对他们本国的地方新闻评价不高，认为相比于全国性新闻，地方新闻更容易受地方精英和本地社会权力结构的影响，不那么具有“看门狗”(watchdog)精神，甚至是失败的新闻业。¹⁷但不少经验研究表明，与其说这是地方新闻的弱点，不如说是其特点。一项对荷兰地方电视观众的定性研究发现，人们期望地方媒体做到的七件事是：提供多样可靠及时公正的地区事务信息、通过让人们了解当地社会来促进社会融合、提供激励和榜样、呈现社区内不同群体、增加当地不同群体之间的了解、维系地方记忆以及增强对当地的归属感。¹⁸这些实际诉求是更具有“建设性”的守望功能，而非单纯的批评和监督，并没有把地方新闻业放在旁观者的位置，而是把它纳入本地生活之中。从中国都市新闻业的实践看，以2002年江苏城市频道《南京零距离》诞生为标志的“电视民生新闻”已经开始具备有中国特色的建设性都市新闻类型的创新潜力。此后，湖南电视台的《都市一时间》、安徽电视台的《第一时间》、河南电视台《都市报道》等相继开播。到2006年，拥有28家成员台的全国省级台民生新闻协作体成立，平均每个成员台创办约3个左右民生新闻栏目，共约80个。¹⁹可惜在短暂的黄金期后，民生新闻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都没有进一步的发展。虽然还有浙江电视台的《1818黄金眼》和河南电视台的《小莉帮忙》等这类电视民生节目中的佼佼者依然活跃，但总体颓势比较明显。况且，数字时代评定民生新闻是否成功的标准更多要看其是否“出圈”(指获得超过本地范围的影响力)，因而故事性、情感性和娱乐属性更强的民生新闻容易以片段(如短视频“拆条”)甚至截图

和表情包的方式在网络空间病毒式传播。这与十余年前业界和学界对民生新闻要从“小民生”转向“大民生”，深入本地社会治理和社会建设的普遍期许，其实已经有较大偏离了。此外，在一些地方性重大突发事件上，都市新闻业等通告或滞后于央媒等报道不及时的问题，也已在互联网上激起不少质疑。

当然，国内都市新闻业在面对新媒体传播环境发生结构性变化的压力下，绝非无所作为。各省级新闻单位努力贯彻媒体深度融合方针、与行政事业机构和政务媒体加强合作、在重大主题报道和宣传策划上倾力而为、用政务服务模式扭转经济困境等，正逐渐形成一种独特的转型路径，其行动模式和长期效果值得学界继续观察研究。同样，地方新闻业和都市新闻业已有的国内外研究成果也需被行动者们关注，包括国际上近年来高度重视的“地方新闻荒漠化”、大都市新闻生态系统剧烈动荡等问题、国内舆论出现的对地方新闻媒体的批评，以及本研究提出的对都市新闻业可能出现的被迫“边缘化”迹象的警惕等。

当都市新闻业的现状被“问题化”以后，接下来就是对问题的分析。近年来，对“新闻业危机”的诊断已经成为新闻创新领域的前置性问题，获得广泛重视，学者们对新闻业危机的指向、表现、归因和解决提出各种推断²⁰，但主要是把新闻业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的，对新闻系统内部的结构差异关注不多，比如对“都市新闻业”的“夹心层”特性研究得还很不充分。而对地方新闻和都市新闻媒体、新闻作品更为常见的网络批评，虽然敏感意识到有问题，却难以提出深层解释。都市新闻业的问题乃至困境有对其进行独立研究的价值，笼统的新闻业危机理论可以解释都市新闻业在数字时代的一些共性问题，但尚不足以理解都市新闻业在新闻系统中的结构特点以及更重要的“地方性”问题。从理解现代性社会的“风险”和“地方”这两大关键概念出发，认为“媒介化风险”和“消逝的地方”是当下都市新闻业面临的两重独特的挑战，而我们对都市新闻业现状的理解、对其危机的诊断、对其转型创新方向的期望，与都市新闻业所面临的独特挑战是分不开的。

二、“媒介化风险”：放大都市新闻业的压力

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首次使用“风险社会”一词来描述现代性发展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工业化社会所产生的各种风险开始占据主导地位，“稀缺社会的财富分配逻辑开始向发达现代性的风险分配逻辑转变”²¹，从而把“风险”问题置于理解现代社会的前台。眼下，经历了两年多新冠疫情全球肆虐的人们对把“风险”作为理论出发点可能尤为有切身感受。在风险社会理论家们看来，风险的必然性根植于社会系统的复杂性之中。正如卢曼(Niklas Luhmann)的观点，“风险不同于危险”。一个人可直接观察到危险(如失火)，随之会做出避险行动；但一个人并不能直接经受风险，但是他可观察到他人的行动、可观察到媒体和专家如何建构风险，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他对风险的解释和行动。无数个个体按照无数不同的逻辑和路径来理解风险并做出行动，由此形成风险社会产生的根本根源。现代社会就是这样“以二元符码化的形式认知高度特别的形式，将风险行为拔高、规范化、语境化”。²²伴随着现代社会功能的不断分化，产生了社会结构的多重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这正是现代社会风险问题的根源。²³由此，媒介就成为理解现代风险问题的关键。一方面，媒介、媒体是进行风险传播的主要力量，要“用清晰、易于理解的语言，向特定的受众提供有意义的、相关的准确信息”。²⁴另一方面，因为“风险毕竟是在知识中生成的，因而它也会在知识中得到放大、缩小，乃至完全被排除在意识的画面之外”²⁵，所以又要警惕媒体的风险建构本身可能成为“风险的夸大者和制造者”或者“风险的有意回避者”。但是，媒介如何进行风险传播问题，重心仍然在如何面对风险上。对媒介与风险关系的另一面，也即媒介化风险社会的现实，对于媒体自身来说意味着什么，尤其是对无法回避风险问题的都市新闻业来说意味着什么，目前的研究却鲜少涉及，而这恰是理解都市新闻业困境的一个深层原因。

都市新闻业无法回避本地的风险议题，因为它的本地性决定了它有责任与地方民众休戚与共，而它在地方新闻系统中的优势地位又说明它有能力和报道。因此，当一地出现重大突发社会事件或公共安全事件等问题时，第一响应者应是该地所在的都市新闻业。换句话说，这些风险议题对都市新闻业的压力比全国性媒体和下级区县媒体的压力更大。全国性媒体对地方重大风险议题尚有选择余地和反应时间，下级区县媒体本身在网络空间的能见度就不够，且如果报道议题确实重大，人们反而能理解它们的力有不逮。但处于夹心层的都市新闻业却无法免于这样的责任。如果在这类议题上失语，一般都会被舆论解读为不肯承担责任而不是能力不足，从而影响本地民众对媒体的信任。做好这类风险议题的报道，本来应该是都市新闻业履行守望社会功能、密切与本地民众关系的良机，但现实中这类议题更像是都市新闻业的烫手山芋——第一时间不响应，而等政府通告或等中央媒体来报

道，成为一种比较常见的做法。都市新闻业为什么会在沉默中等待？笔者在调研中了解到，新闻人既对他们报道的滞后甚至失语感到焦虑和沮丧，也对网络舆论深感不安，并在这类议题上表现出一种无力感。这实际上也反映出都市新闻业固化的“夹心层”位置难以应对“媒介化风险”之复杂性的深层矛盾。

风险议题虽然发生于某一个地点，但其涉及到的行动者之多、范围之广、层级结构之复杂往往超出人们的朴素认知。如2021年7月底南京地区爆发因禄口机场清洁工感染新冠而外溢的疫情，这一事件在网络上被称为“南京禄口机场爆发疫情”，并很快冲上热搜。可禄口机场虽然位于南京市江宁区禄口街道，但隶属于东部机场集团，南京市并无直接管辖权。同样，南京本地疫情早期采用大数据方法测算并自动为大批居民生成黄码，其参与决策者也超出南京市甚至江苏省。但是在风险建构中，这一事件的命名方式“南京疫情”则是地方性的。风险应对是高度复杂的，但作为风险报道者的都市媒体却必须遵循体制内的媒体层级，很多问题难以及时报道或只以内参方式上报。此外，都市新闻业与其他体制内媒体一样，必须坚持正面报道为主的导向，但媒介化风险环境总会在第一时间产生大量关于风险的舆论，包括求助、对风险处理不满或不解等信息，很容易产生“网络舆情问题”。负面舆情一经显露，都市新闻业更要加大正面报道的比重以“引导舆情”。实际上，当这两种力量往相反的方向强化风险议题建构时，常会导致媒体空间和网络空间“两个舆论场”分离的现象更加明显。

数字时代的媒介化风险呈现出的这种集中爆发、大量个体参与风险叙述、风险行动者的关系和结构非常复杂等特征，不仅给都市新闻业在报道风险议题上带来巨大压力，甚至会让它们对风险议题的报道本身成为“风险”。贝克就曾谈及风险社会可能出现的“替罪羊效应”，他说：“不是危险而是那些指出危险的人造成了普遍的不安。”²¹ 因为厌恶风险，进而回避新闻，这已经被国外多个实证研究证明。如一项对西班牙地方媒体报道当地石化企业风险的研究表明，与研究者预想的不同，居住在化学风险和核风险地区的人并不总是愿意接受告知他们生活在风险环境中的信息。²⁵ 澳大利亚地方政府甚至让人们少接触点新冠新闻，以保持身心健康。²⁶ 但这并不说明人们喜欢当鸵鸟，而是说明人们对风险信息的需求高度灵活。国内都市新闻业也可能在风险传播中被当成“替罪羊”，但逻辑完全不同。在最近的上海疫情中，东方卫视本打算在4月13日以云录制方式制作的公益性专题节目《众志成城同心守护——东方卫视抗疫特别节目》，因遭遇巨大反对而暂缓播出。东方卫视官微下的1.2万条评论绝大多数都是批评媒体此时的正能量宣传不合时宜，其中热度最高（达到4.8万点赞量）的网民评论说，请东方卫视上街直播，查查哪些人在哄抬物价、跟踪各援助物资发放情况、关注孤寡老人、危重病人、血透化疗患者等。²⁷ 在现代社会，公众往往既接触不到风险治理的实际管理者，也接触不到真实可见的风险后果，他们能接触到的是媒体呈现给他们的风险叙事。当这种叙事不符合他们的期待，或者与他们从其他渠道了解的风险叙事相差甚远时，容易成为舆情爆发点的可能并非是风险或风险治理本身，而是媒体如何建构风险。这会让都市新闻业在处理此类议题时更加左支右绌。

三、“消逝的地方”：模糊都市新闻业的定位

英国学者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也认为风险社会是现代性的一种后果，他特别强调的是让现代性产生、扩张甚至过分膨胀的机制：时空分离和脱域过程。在传统社会，空间和地点大体是一致的，人们要进行社会活动就要亲身在场(presence)。但“现代性的降临，通过对‘缺场’(absence)的各种其他要素的孕育，日益把空间从地点分离”，成为脱域(dis-embedding)过程的初始条件”。²⁸ 所谓“消逝的地方”指的就是这类现象。这一过程可能会遭遇包括“逆向全球化”在内的各种抵制，但总体来说，脱域过程“凿通”社会活动与在场情境的关系，这一趋势恐怕是无法避免的。新冠疫情中，多少过去被认为无可替代的“现场”，甚至戏剧、音乐会等都被搬到了线上，无数天南海北的人们用点赞和弹幕代替了现场的荧光棒。这里并不讨论这些本来是现场艺术的表现力是否因此被损害，但类似脱域过程一旦开启，恐怕就回不去了。相信疫情结束后，共同“在线”而不是物理“在场”仍然会成为很多社会活动的实践方式，至少会是一个灵活的备选项。

相比于全国性媒体、区县媒体以及行业媒体和垂直媒体，都市新闻业受到“消逝的地方”及其代表的社会后果的冲击要更为直接和负面。除了前文提到的都市新闻业在过去占绝对优势地位的地方新闻市场上受到挤压外，这里更要指出，都市新闻业赖以生存的地方新闻空间本身已变得不再稳定。美国新闻学者厄舍(Nikki Usher)在她的新著《白富蓝新闻：场所和权力如何扭曲美国新闻业》中专门讨论了美国新闻业的“地理大调整”，结论之一是，美国地方性的稳定的新闻市场已经消失了。²⁹ 在去年给

南京大学新闻创新工作坊的演讲中，厄舍也提到：“在美国，只有国家的、非地方性的媒体才有可能存活下来。那些被民主党自由派人士消费的新闻呈现出高度去地方化的特点。最有可能在经济危机中生存下来的新闻机构是那些位于沿海地区的大型全国性媒体和国际化媒体，但它们根本无法以同样的深度报道地方新闻，那些媒体记者抱有的世界主义取向实际上可能更为狭隘。”³⁰ 这个结论或许有些激进，但更值得重视的是作者的逻辑：一方面，因为本地新闻使用者有限，能从特定地域的使用者中挖掘的收入也是有限的，当全国乃至全球新闻品牌占领了地方新闻用户的新闻使用时间乃至付费意愿后，地方新闻媒体就失去了它们的供养来源；另一方面，即便都市新闻业在某些特定的议题上有便利报道的优势，也无法转换成长期稳定的经济收益。如《迈阿密先驱报》曾凭借靠近古巴的地理优势抢先报道卡斯特罗逝世专题，并获得全球性关注和巨大流量。但这种一时被重大事件吸引的注意力无法转换成读者对地方新闻品牌的长期忠诚，也就无法转换成商业价值。美国的商业主义地方报业体制和中国都市新闻业的情况不同，但以上分析对于理解在上一轮新闻改革中更多依靠地方新闻市场驱动而成功的国内都市报和民生新闻的困境，仍然是有解释力的。

面对如此压力，都市新闻业采用的转型策略可能还进一步加速了“去地方化”的趋势。总体来看，都市新闻业紧紧跟随全国性新闻品牌的转型步伐，扩张数字新媒体矩阵、成立多个新闻品牌应用 APP、提升新媒体中心的地位、在微博抖音等社交平台上展开新闻竞争等。这些策略成功帮助都市新闻业实现了数字化，但却可能对它们扎根地方无所助益。当都市新闻业在数字化浪潮的裹挟下，也变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强调全网热点话题，并要努力跟上无间断无休止的新闻流时，势必会把大量精力花费在追逐网络热点上，而不是深耕地方社区。即便都市新闻业原创的地方性新闻内容在数量上并不比数字化转型之前少，但无论如何都无法满足 APP 之类需要巨大新闻流支撑的端口而不得不用大量全球全国和外地新闻热点来填充，这也让很多都市媒体的数字端口看上去缺乏个性，更像是全国性媒体的低配版，也就更加不容易培养地方新闻受众对本地媒体的忠诚度。那么都市新闻业是否可以干脆采取去地方化策略，与全国性媒体竞争？从国外的实证研究来看，这一策略非常难以实现。以美国的报业市场结构为例，只有极少数全国性报纸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今日美国》等有实力投资复杂且昂贵的数字技术系统，并拥有庞大的专业技术人员，它们已经走上了规模扩张的道路；大多数小地方报纸和社区报纸变化不大，尽管有些地方出现了新闻荒漠，但调查显示发行量较小的报纸其实更不容易出现裁员等问题。³¹ 因为小规模地方媒体的成本也小，有时依靠一些地方基金为数不多的支持就可生存；而费城、圣地亚哥、波士顿、迈阿密、达拉斯这样的大都市报纸则不同，它们既无法以低成本运作，又无法像更有实力的全国性新闻品牌那样在创新上大笔投资。一项针对 2006—2016 年间美国大都市报业生存状况和创新策略的研究称，“20 年的经验表明，仅仅追逐点击率、数字读者和收入并不是都市报的成功策略”，都市新闻业不能通过模仿全国性媒体的数字化转型获得成功。³² 这些实证研究还仅仅是考察了经济层面的影响，如果结合中国语境下地方性新闻与中央媒体在制度资源上的差异，以及高度有中国特色的各地政务媒体的崛起等因素，数字时代的中国都市新闻业要想通过追随和模仿的转型策略冲进全国新闻市场，难度远远大于都市报时代。

四、探讨都市新闻业的创新之路

都市新闻业面临的问题是独特的。作为现代性后果的“媒介化风险”和“消逝的地方”对都市新闻业的冲击和深层影响大于全国性新闻媒体、区县媒体和行业媒体。如果仅仅把新闻业危机或新闻业创新作为一个整体来考量，很可能会因为忽略都市新闻业面临的特有挑战而难以形成准确的危机诊断，进而采用更有针对性的创新策略。目前来看，都市新闻业在新闻系统结构中的夹心层位置和相对固化的行动路径，使其在应对这双重挑战时出现较多困境。

都市新闻业的重要性又是无可替代的。从某种方面看，中间层的地位亦可成为一种优势，因为都市新闻业既有独特的地方性，又有相当的影响力。理想的都市新闻业应能与地方机构形成良好的建设性关系、能通过高质量的新闻工作让地方民众产生信赖感、能成为舆论场上凝聚共识的理性力量，并在网络时代容易激化的舆情事件中扮演解压阀和缓冲带角色。

虽然都市新闻媒体之间的差异也是明显的，但对于都市新闻业面临的双重挑战来说，讨论都市媒体之间的具体差异不如关注都市媒体与全国媒体、区县媒体、行业媒体的结构性差异更有解释力。当出现如“某地疫情”这样从特定地方爆发的重大事件时，都市新闻业的表现是共性大于差异，并且也基本反映出前文所讨论的共同的困境。笔者团队对都市新闻媒体在新冠疫情中的

应对进行了初步调研，我们发现若仅按照在都市报时代发展起来的媒体批评话语评判媒体表现是不够的，需要在更深的结构层面对都市新闻业的问题加以解释，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展开都市新闻业如何面对挑战的讨论。

都市新闻业的创新之路和转型方向不是技术驱动型的，尽管新技术的部署和应用非常重要，但它起到的是接入数字空间的作用，这是如今绝大多数媒体都必须完成的基本动作；都市新闻业的创新之路也不是市场规模驱动的，因为地域天然限制了它的发展空间，要在全中国和全球新闻市场上竞争“流动的公众”的注意力，都市新闻业有很多内在限制；都市新闻业的创新之路应该是由复杂关系驱动的，也即要更好地满足大都市社会活跃用户的多元需求、建立起对地方事务权威及时的报道网络、形成与地方机构长期的建设性互动，促成良好的地方新闻生态系统和舆论环境。行业性媒体、垂直媒体的创新虽然也同样是关系驱动的，但它们要处理的往往是上下游的线性关系，而都市新闻业要处理的则是更为复杂的网络状关系。都市新闻业的创新之路，可能也是现有新闻业格局内创新和转型难度最大的道路。给都市新闻业在制度上“赋能”，使其以更灵活主动的方式“再嵌入”地方生活可能是当前最需要的创新策略。可具体展开的创新行动包括：改变在处理“媒介化风险”时力不从心的状态，更主动地协同与各级地方行政管理机构的关系，容纳而非回避地方新闻市场上的多元行动者，并力争在地方新闻行动者网络中成为能影响其他行动者的核心节点，以都市生活守望者的角色赢得地方新闻公众的信任，唤起他们的共同责任等。

都市新闻业的创新之路也许很艰难很复杂，但仍然是值得期待的。因为作为空间的“地方”也许会消逝，但承载着家园感的“地方”永远对人们有感召力。

注释：

1 刘洁：《马克思“用时间去消灭空间”：溯源及新闻传播学扩散》，《国际新闻界》2010年第9期。

2 白红义：《因时而作：新闻时间性的再考察》，《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6期。

3 陈百龄：《追风赶秒：新闻组织的时间结构化策略》，（台湾）《新闻学研究》2016年第127期。

4 Penelope Muse Abernathy, *The Expanding News Desert*,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8.

5 Zelizer, B., *Terms of choice: uncertainty, journalism, and crisi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5, 65(5), pp. 888-908.

6 Pretty, Kate, “Dusting Off the Grass Roots: A Survey of Australian Country Journalists”, *Australian Studies in Journalism*, 1993, 2(1), pp. 75-123.

7 Folker Hanusch, *A Different Breed Altogether?* *Journalism Studies*, 2015, 16:6, pp. 816-833.

8 Charles H. Levermore, *The Rise of Metropolitan Journalism, 1800-1840*,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01, Vol. 6, No. 3, pp. 446-465.

9 迈克尔·舒德森：《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陈昌凤、常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78/2009年版。

10 王辰瑶：《新中国新闻报道史暨代表作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11 C. W. 安德森：《重建新闻：数字时代的都市新闻业》，王辰瑶译、李红涛校，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2022年版。

12 Margaret Sullivan, *Ghosting the News: Local Journalism and the Crisis of American Democracy*, New York: Columbia Global Reports, 2020.

13 陈国权:《寻找“非市场需求”——2019 中国报业转型发展报告》,《编辑之友》2020 年第 2 期。

14 Xiong, H., Liu, X., & He, Y., *Claiming Legitimacy: Journalists' Discursive Strategies for Rationalizing "Brand Propaganda" Within Chinese Local Press*, *Journalism Studies*, 2021, 22 (4), pp. 435-453.

15 陈力丹:《坚持党性, 尊重规律, 以人民为中心——习近平新闻舆论观的两个要点和一个落脚点》,《新闻记者》2018 年第 7 期。

16 张立伟:《从〈华西都市报〉看报纸定位创优效应》,《当代传播》1998 年第 3 期。

17 O' Neill, Deirdre, and Catherine O' Connor, "The Passive Journalist: How Sources Dominate Local News", *Journalism Practice*, 2008, 2 (3), pp. 487-500.

18 Costera Meijer, Irene, "Democratizing Journalism? Realizing the Citizen's Agenda for Local News Media", *Journalism Studies*, 2010, 11 (3), pp. 327-342.

19 《中国电视民生新闻发展报告》课题组:《交流·合作·共赢: 中国电视民生新闻发展考察》,《现代传播》2011 年第 9 期。

20 王辰瑶:《反观诸己: 美国“新闻业危机”的三种话语》,《国际新闻界》2018 年第 8 期。

21 (25) (26) 【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 新的现代性之路》,张文杰、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 1986/2018 年版,第 3、84、85 页。

22 【德】尼克拉斯·卢曼:《风险社会学》,孙一洲译,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3/2020 年版,第 118 页。

23 张广利等:《当代西方风险社会理论研究》,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32 页。

24 郭小平:《风险社会的媒体传播研究: 社会建构论的视角》,学习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0 页。

25 (27) Enric Castelló, *Framing news on risk industries: Local journalism and conditioning factors*, *Journalism*, 2010, 11 (4), pp. 463-480.

26 (28) Kate Mannell & James Meese, *From Doom-Scrolling to News Avoidance: Limiting News as a Wellbeing Strategy During COVID Lockdown*, *Journalism Studies*, 2022, 23 (3).

27 (29) 蒋伟:《〈东方卫视抗疫特别节目〉暂缓播出》,微信公众号 ID: 传媒特训营, 2022 年 4 月 13 日。

28 (30) [英]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 1990/2000 年版,第 16—18 页。

29(31) Nikki Usher, *News for the Rich, White, and Blue: How Place and Power Distort American Journal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21.

30(32) 尼基·厄舍:《场所和权力如何扭曲美国新闻业》,《新闻记者》2021年第11期。

31(33) Grieco, E., Sumida, N., & Fedeli, S., About a third of large U.S. newspapers have suffered layoffs since 2017, Pew Research Center, 2018. Retrieved from <http://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8/07/23/about-a-third-of-large-u-s-newspapers-have-suffered-layoffs-since-2017/>

32(34) Mikko Villi, Mikko Grönlund, Carl-Gustav Linden, Katja Lehtisaari, Bozena Mierzejewska, Robert G. Picard & Axel Roepnack, “They’re a little bit squeezed in the middle”: Strategic challenges for innovation in US Metropolitan newspaper organisations, *Journal of Media Business Studies*, 2020, 17:1, pp. 33-50.